

甘青宁三省区农村汉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与研究

赵小刚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西北大学 211 工程专项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甘青宁三省区农村汉语言文字 应用问题调查与研究

赵小刚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青宁三省区农村汉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与研究/
赵小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140-0

I. ①甘… II. ①赵… III. ①西北方言—方言字—调查
研究 IV. ①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647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甘青宁三省区农村汉语言文字
应用问题调查与研究

赵小刚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0140-0

2013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8 附录 3 1/4

定价: 50.00元

目录

前言 001

一、调查目的 003

二、调查方法 003

三、调查所考虑的因素 005

四、调查地点、被调查人数及问卷发放与回收的数量 007

五、调查内容 019

六、相关说明 019

第一章 甘青宁三省区农村居民普通话应用状况调查与分析 022

第一节 农村居民对推广普通话政策法规的了解及对
推普意义的认识状况 022

第二节 农村居民中应用普通话的人群 028

第三节 农村居民应用普通话的基本状况 031

第四节 农村居民应用普通话的实际情况 079

第二章 甘青宁三省区农村居民汉字应用状况调查与分析 224

第一节 农村居民对汉字有关政策法规的了解及对应用

规范汉字意义的认识状况 225

第二节 农村居民中应用汉字的人群 236

第三节 农村居民应用汉字的基本状况 240

第四节 农村居民应用汉字的实际情况 255

第三章 甘青宁三省区农村居民汉语拼音应用状况调查与分析 297

第一节 农村居民对汉语拼音有关政策法规的

了解及认识状况 297

第二节 农村居民中应用汉语拼音的人群 302

第三节 农村居民应用汉语拼音的基本状况 303

第四节 农村居民掌握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

具体情况 321

第四章 对甘青宁三省区农村居民汉语言文字应用状况

调查结果的判断 365

第一节 对基本状况的判断 365

第二节 对具体情况的判断 368

第五章 对甘青宁三省区农村居民汉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偏低原因的探讨 374

第一节 语言文字政策贯彻不力 375

第二节 交际状况与经济水平制约 379

第三节 传统思想观念影响 384

第六章 提升农村居民汉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建议 389

第一节 提升农村居民应用汉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总体建议 389

第二节 提升农村居民汉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具体建议 396

后记 408

补记 411

附录（别册装）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述：

第一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1958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报告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第二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发展的新时期。1986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将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调整为五项：1. 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2. 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3. 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4. 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5. 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

第三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深入时期。1997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将语言文字工作任务明确为四条：1. 坚持普通话的法定地位，大力推广普通话；2. 坚持汉字简化方向，努力推进全社会用字规范化；3. 加大中文信息处理的宏观管

理力度，逐步实现中文信息技术产品的优化统一；4. 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扩大使用范围。

可以看出，虽然语言文字工作任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内容有所增减，但贯穿始终的任务是：推广普通话，整理并推行现代规范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关于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汉语研究，出现了一批较好的成果。显然，学界已经意识到了研究西部地区汉语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纵观整体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其大部分还是一些地点方言的调查与描写，缺乏关于西部地区的普通话、规范汉字、汉语拼音应用问题的整体研究。毫无疑问，方言研究是区域语言、现代汉语研究的基础，其意义不言自明，因此我们应当对方言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当今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的意义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随着国家对广大农村地区社会 and 经济发展问题日益关切，农村的语言文字应用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无疑是语言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有力助推，是语言学工作者对改革开放的最佳的参与形式。

我们看到，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极大，三省区农村想要开放，农村人想要跟外界交往，必须学习并应用普通话，可是关于三省区普通话应用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缺乏；三省区农村居民对掌握和应用现代规范汉字有着很不一致的认识，且在全部农业人口中，能够使用汉字的人数所占比例极小，而目前对这一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很少；《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推行了半个多世纪，但三省区农村居民对此方案的掌握与应用状况令人担忧：一般人似乎漠不关心，语文教育工作者大多缺乏必要训练，这给推

行《汉语拼音方案》造成了极大困难，而且其中原因很少有人加以探讨。为此，我们设计了“甘青宁三省区农村汉语言文字应用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课题，想借此深入了解三省区农村人口应用普通话、现代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的状况，正确估价人们的心理状态与现实动机；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为有关职能部门掌握省区情况、制订合乎实际的语言文字规划和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调查目的

掌握和了解三省区农村居民普通话、现代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的应用状况，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三省区农村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环境相对封闭。人们关于普通话、现代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的观念怎样？掌握和应用的目的是什么？

（二）三省区农村多民族杂居，不同语言背景、不同民族的人员使用普通话、现代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的情况有何不同？

（三）三省区农村各类人群应用普通话、现代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的能力如何？

二、调查方法

各种方法综合使用，分而言之，有下列几种：

（一）访谈法

调查人员每到一地，即通过有关部门或联络人员的安排，主动与当地居民交谈。交谈内容从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到了解国家政策推行情况，从了解人们的文化观念到了解人们的语言文字观念。有时只为了从交谈中了解有关情况，有时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很多调查线索都是从访谈中获得，有些现象的解释说明也是从访谈中得到启示。

（二）问卷法

根据调查目的设计适量题目，制成问卷。由被调查人对问卷题目作答，调查人加以记录。如果被调查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则由被调查人自己阅读题目与相关内容并作答；若被调查人是文盲半文盲，则由调查人阅读题目与相关内容，被调查人听取并加以选择，然后由调查人代为作答。

（三）观察法

调查人员到达村庄、学校、集贸市场等场所，不主动提问，一般性地观察人们使用普通话、现代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的状况。如校园里教师和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情况、学生的试卷作业书写情况，集贸市场交易中外地客商与当地人谈话的言语形式，乡镇干部讲话的言语形式，乡镇村庄的墙头屋背标语用字状况等。

（四）通讯法

一些需要核实、个别了解的问题，一些在调查中没有很好掌握而需要补充的问题，一些基本数据问题，我们利用信件、电话方式加以解决。

我们的整个调查从走访开始，课题组人员分赴一些村庄进行访谈，分别召开不同范围的座谈会，在此基础上确定调查内容；然后拟定问卷、确定被调查的人数、联系并落实当地收发问卷联络人。

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掌握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农村人口的汉语言文字应用状况，顾及地域状况（如山区与川区、村庄与乡镇）、文化状况（如民族聚居区与杂居区、语言背景）、人口状况（如性别与职业、年龄与文化程度）等方面因素，我们采取普遍调查的手段，尽量涉及三省区所有县份。

三、调查所考虑的因素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民族、语言背景、性别、身份、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观和语言文字应用行为都有一定影响。因此，这些都应当是调查所涉及的因素。

（一）民族

三省区农村具有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民族成分。除汉族以外，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族是回族、藏族、蒙古族等。为了便于统计分析，

我们把所有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人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族，另一类是非汉族（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二）第一语言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一般说来，这就是第一语言。有的民族，如回族、满族，已经完全使用汉语，其第一语言即为汉语，这时就出现了民族跟语言不一致的情况。另外，在宁夏调查时了解到，同一个少数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其不同年龄人员使用不同的第一语言，往往是年龄较大者的第一语言为本族语，而年龄较小者的第一语言为汉语。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我们把所有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人群按第一语言状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语人群，另一类是非汉语人群。

（三）性别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三省区农村地区一般都是男性与外人接触交往，女性不敢或不好意思跟不熟悉的人交谈。青海、宁夏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我们调查过程中，明显感觉到这一点，即男性愿意配合调查，而女性多借故推托，因此接受调查的男性人数比例明显大于女性。

（四）身份

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决定人们的身份。我们把被调查人员分为农

民、牧民、教师、学生、乡镇干部、大夫、商贩、手艺人、宗教界人士。在甘肃和宁夏，纯牧民较少，所以我们把农牧民都视为农民；青海省牧民较多，与农民分别统计分析。

（五）年龄

我们初次去宁夏调查时，把人员分为7—20岁、21—30岁、31—40岁、41岁以上四个年龄段。以后，去甘肃、青海和第二次去宁夏调查时，又把三省区的调查对象分为五个年龄段，即15岁以下、16—30岁、31—45岁、46—60岁、61岁以上。每个年龄段的差距是15岁左右。这个差距基本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人的语言文字观念、语言文学应用水平等。进行最终分析时，统一按照五个年龄段考虑。

（六）文化程度

我们初次去宁夏调查时，把被调查人员文化程度分为小学、中学、大专本科三个等级。以后，去甘肃、青海和第二次去宁夏调查时，又把调查对象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中学、大专本科四个等级。进行最终分析时，统一按照四个等级考虑。

四、调查地点、被调查人数及问卷发放与回收的数量

调查尽量覆盖三省区农村所有县份。问卷发放数量略比原计划数量多余，以便于选择。

调查时我们发现，三省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应用普通话、现代规范汉字、汉语拼音的人数依次呈递减状，即说普通话的人数最多，应用汉字的人数次之，应用汉语拼音的人数最少。因而，所发放的应用普通话状况的问卷数量最大，应用汉字状况的问卷数量次之，应用汉语拼音状况的问卷数量最小。

（一）甘肃省

1. 调查地点与数量

甘肃省地形呈西北向东南倾斜的狭长状。自西向东，我们调查了酒泉市的敦煌市、金塔县、安西县，张掖市的山丹县、民乐县、临泽县、高台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金昌市的永昌县，武威市的民勤县、天祝县、古浪县；白银市的白银区、平川区、靖远县、景泰县、会宁县，兰州市的皋兰县、榆中县、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县、康乐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迭部县、玛曲县、碌曲县、夏河县，定西市的岷县、渭源县、陇西县、通渭县、漳县、临洮县，平凉市的灵台县、静宁县、崇信县、华亭县、泾川县、庄浪县，庆阳市的庆城县、镇原县、合水县、华池县、环县、宁县、正宁县，天水市的武山县、甘谷县、清水县、秦安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陇南市的成县、礼县、康县、文县、两当县、徽县、宕昌县、西和县。

以上共 66 个市、区、县。各市、区、县选择 2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 2 个自然村。这样，我们选择的调查地点数为： $66 \times 2 \times 2 = 264$ 。

2. 被调查的人数

我们在甘肃省的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主要的目的是摸索情况，同时对农村居民的语言文字观念、讲说普通话、识字、使用拼音的基本状况进行了解，主要对 15 岁及以上人员作了调查。我们从每个村选择 10 位农民（虽然有些地方有牧民或半农半牧民，但总量较少，所以一概算作农民）、平均 2 位教师、5 位学生，每个乡镇选择 2 位乡镇从业人员（包括乡镇干部，大夫、本地商贩、手艺人，宗教界人士等）。被调查的各类人员数量为：农民 $264 \times 10 = 2640$ 人，教师 $264 \times 2 = 528$ 人，学生 $264 \times 5 = 1320$ 人，乡镇干部 $66 \times 2 \times 2 = 264$ 人。被调查人员的有效数应为： $2640 + 528 + 1320 + 264 = 4752$ 。

这次调查，由我们自己调查填写和联络人发回的调查问卷共 5100 套，其中 281 套因为内容不完整或漏填等原因成为废卷，约占回收卷的 6%。其余 4819 套悉为有效问卷，且覆盖了上述所有市、区、县的乡镇。这样，有效卷数量比设定调查人数多出： $4819 - 4752 = 67$ 套。于是，在不影响调查对象和人数分布的情况下，我们抽去多余的 67 套问卷，不作统计与分析。

从确定要分析的问卷中，我们统计得到：汉族 3372 人，非汉族 1380 人；第一语言为汉语者 4429 人，第一语言为非汉语者 323 人；男性 2424 人，女性 2328 人；15—30 岁者 1454 人，31—45 岁者 1327 人，46—60 岁者 1238 人，61 岁以上者 733 人；文盲半文盲 523 人，小学文化程度者 1244 人，中学文化程度者 2604 人，大专及本科文化程度者 381 人。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我们根据工作需要，选择了 241 人作为访谈对象（包括不同民族、语言背景、性别、身份、年龄、文化程度的人员，其中 119 人也是接受问卷调查者）。

第二次调查，我们主要在15岁以下人员中进行。在上述264个调查点上，我们选择的调查对象只有学生和农民，每个村选择4位学生、2位农民。被调查人员的有效数应为： $264 \times (4 + 2) = 1584$ 。

这次调查，由我们自己调查填写和联络人发回的调查问卷共1800套，其中98套因为内容不符合要求或漏填等原因成为废卷，约占回收卷的5%。其余1702套悉为有效问卷，且覆盖了上述所有市、区、县的乡镇。这样，有效卷数量比设定调查人数多出： $1702 - 1584 = 118$ 套。于是，在不影响调查对象和人数分布的情况下，我们抽去多余的118套问卷，不作统计与分析。

从这些问卷中，我们统计得到：汉族1217人，非汉族367人；第一语言为汉语者1461人，第一语言为非汉语者123人；男性861人，女性723人；农民528人，学生1056人；文盲半文盲214人，小学文化程度者921人，中学文化程度者449人。

同样，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我们根据需要，选择了198人作为访谈对象（其中84人也是接受问卷调查者）。

两次调查所选择的访谈对象共 $241 + 198 = 439$ 人。

3. 各类问卷数量及被调查人员分布

我们从甘肃省两次所作的调查结果中，统计各类问卷数量如下：

（1）通用语言文字观调查问卷及被调查人员分布

通用语言文字观调查问卷共4752份。汉族3372人，非汉族1380人；第一语言为汉语者4429人，第一语言为非汉语者323人；男性2424人，女性2328人；农民2640人，教师528人，学生1320人，乡镇从业人员264人；15—30岁者1454人，31—45岁者1327人，46—60岁者1238人，61岁以上者733人；文盲半文盲523人，

小学文化程度者 1244 人，中学文化程度者 2604 人，大专及本科文化程度者 381 人。

（2）普通话应用状况调查问卷及被调查人员分布

普通话应用涉及各类人员，所以此类问卷的数量即是所有被调查人的数量减去废卷或不合格卷数量，亦即有效卷的数量。其总量为 4752（第一次调查）+ 1584（第二次调查）= 6336 份。涉及的人员及其信息情况为：汉族 3372 + 1217 = 4589 人，非汉族 1380 + 367 = 1747 人；第一语言为汉语者 4429 + 1461 = 5890 人，第一语言为非汉语者 323 + 123 = 446 人；男性 2424 + 861 = 3285 人，女性 2328 + 723 = 3051 人；农民 2640 + 528 = 3168 人，教师 528 + 0 = 528 人，学生 1320 + 1056 = 2376 人，乡镇从业人员 264 + 0 = 264 人（其中乡镇干部 132 人，大夫、商贩、手艺人 96 人，宗教界人士 36 人）；0—15 岁者 318（第一次调查中的 15 岁人员）+ 1584（第二次调查的 14 岁及以下人员）= 1902 人，16—30 岁者 1454（第一次调查中 15—30 岁人员）- 318（第一次调查的 15 岁人员）= 1136 人，31—45 岁者 1327 + 0 = 1327 人，46—60 岁者 1238 + 0 = 1238 人，61 岁以上者 733 + 0 = 733 人；文盲半文盲 523 + 214 = 737 人，小学文化程度者 1244 + 921 = 2165 人，中学文化程度者 2604 + 449 = 3053 人，大专及本科文化程度者 381 + 0 = 381 人。

（3）汉字应用状况调查问卷及被调查人员分布

汉字应用只限于非文盲人员，即具有小学、中学或大专本科文化程度的人员。这样，有应用汉字能力的人员数量就是所有人员数量减去文盲半文盲数量，即 6336 - 737 = 5599 人。涉及的人员及其信息情况为：汉族 2956 + 1158 = 4114 人，非汉族 1231 + 254 = 1485 人；第一语言为汉语者 4043 + 1173 = 5216 人，第一语言为非汉语者 282 + 101 = 383 人；男性 2244 + 731 = 2975 人，女性 2200 + 424 = 2624 人；农民